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七辑

吴振武题



中华书局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七辑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字研究. 第27辑/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9

ISBN 978-7-101-06124-6

I. 古… II. ①中…②吉… III. 汉学-古文字学-文集
IV. H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952 号

-
- | | |
|------|--|
| 书 名 |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 |
| 编 者 |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
| 责任编辑 | 陈 乔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½ 插页 2 字数 55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124-6 |
| 定 价 | 88.00 元 |
-

卅载回眸(代序)

曾宪通

1978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美丽的长春南湖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这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当时一潭死水般的学界简直有着振聋发聩的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工作重点之后,各种类型的学术团体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79年4月(西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于1980年10月(武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均作为团体会员参与发起和筹备工作。

古文字学界为什么能够在构建群众性学术团体方面率先迈出如此关键一步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得益于祖宗的赐予。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即便在十分封闭禁锢的“文革”时期,有关单位也不得不举办诸如“出土文物出国展”之类的活动,《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国家文物局还特地组织专业人员从事出土秦汉简帛的整理工作。尽管当时主其事者也标榜“为政治服务”,但客观上却显示出古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富生命力的学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打开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受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其次是当时古文字研究的现状令人堪忧,抢救工作迫在眉睫。回顾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前的情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在古文字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的郭沫若同志刚刚谢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加上工具书奇缺,技术设备落后,所有这些,与层出不穷大量涌现的古文字资料形成了强烈的落差,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改变。然而,促使迈出这关键一步的更加直接的重要因素,则是以于省吾老先生为首的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学术团队勇于肩负历史使命和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冲破重重的枷锁,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提出了各种可行的方案,动员所有的力量,争取各方的支持。记得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同志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他纵横穿梭,舟车南北,终于促成这一举世瞩目的创举。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36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文物单位和新

闻出版部门的代表,共提出论文和报告 33 篇。会议通过协商推选出领导小组和会务组,负责领导和主持工作。综观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内容,有几点记忆犹新,值得回顾和追述。

1977 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中山王墓青铜器,是大会首先关注的热门话题。该墓出土的一鼎二壶对史书上记焉不详的中山国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会上张政烺先生的《中山王鬲壶及鼎铭考释》和《中山国胤嗣豸壶释文》、赵诚的《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和孙稚雏的《中山王鬲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一组论文,对通读铭文及阐明三器的史料价值有重要意义,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和讨论。中山王墓四器(另一器为兆域图)在古文字学上也有其特殊的意义。据统计,以上四器共有铭文 1573 字,其中过去字书未见的字就有 149 个,几乎占第四版《金文编》新增字头的四分之一强,由于这些字的出现和获得确解,使许多过去不认识的字词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馆长在会上介绍了 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成果,特别突出介绍了墓中出土的 64 枚编钟。这套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的巨型青铜甬钟,由其同出的楚王钟得知其年代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 433)。编钟上有错金铭文 2800 多字,标记音阶名和乐律名,根据编钟的实测音高,可以了解到这套编钟的音阶名体系和乐律名的音高系列,从而揭示曾国音阶铭与乐律铭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列国乐律的相互关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整套编钟的音域广达五个半八度,可以旋宫转调,显示战国初期的钟律学,已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极高的水平。于豪亮在会上发表《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乙墓》一文,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讨论。

无论是河北的中山王还是湖北的曾侯乙,都是战国时期偏处一隅的蕞尔小国,然而这次出土的大批礼乐器,不但形制巨大,数量众多,其内涵亦十分丰富。它们和通常所见的“物勒工名”式的简铭不可同日而语。通过这些材料,大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对战国题铭过于简略的传统看法。两墓出土这么大量的古文字资料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而基本获得通读,这也充分显示了当年学术界的识字水平。

会上有关两周和秦汉金文的论文出现令人可喜的成绩。如李学勤对近年发现的张家村和庄白村两处窖藏青铜器铭文作了综合研究,他以共王时代的墙盘为标准器排比相关器主的世系,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问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于省吾先生对寿县蔡侯墓的青铜器铭文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考释,在释字、文义和墓主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陈世辉对墙盘铭文的考释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林沅改称传世的召伯虎簋为珣生簋,主张其铭文应当连读并重新加以释读。张振林修正了肖蕴对满城汉墓出土铜壶上的错金鸟虫书铭文的读法,在释字和文义方面也有不少新见解。马国权的《周代铭文中的数词、量词初探》揭示铜器铭文中有关数量词的现象和规律,在金文研究中别开生面。

大会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会前李学勤提出“历组卜辞”有可能早到武丁时代。会上沈建华对此表示赞同并提供了新的证据。曹定云根据小屯南地发现的

甲骨,认为“自组卜辞”才属于武丁时代,“历组卜辞”似无到武丁时代的可能。还有人认为仍应该维持董作宾对卜辞分期的意见。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往后数届古文字年会争论的中心。

甲骨文考释和商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发现罕见的“我王”合文,并对其含义作了阐释;张政烺先生论证了“它示”一词与“二示”同义,纠正过去把部分双钩的“它”误释为“蚕”的错误;裘锡圭系统分析了卜辞中的否定词,指出“不、弗”与“弜、勿”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所不同,对“弜、弗通用”说提出异议;林沅重点讨论了“非王卜辞”中的“子卜辞”,并对其内容重新加以解释。此外,姚孝遂强调在考释工作中必须仔细核对和辨认原始材料的字形,不能盲目因袭旧说。并举出大量的例子,证明过去把俘虏与奴隶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陕西省文管会徐锡台先生在会上报告了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发现的成坑甲骨,并分类列举了一些卜辞的内容,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从周原发现的甲骨文看来,周人早在周文王受命以前,就已经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中经开国之武王,直至成康昭穆,其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周原甲骨与殷墟比较,仍是大同而小异:如它们都出自都城遗址和有意的埋藏,刻辞都有守兆的习惯等。而最明显的不同,是周原甲骨辞简字小,具备前辞、贞辞、占辞、验辞几部分的卜辞极为罕见,一般只有贞辞或占辞,二者兼有者甚少,前辞更少。字数少的一二字,最多一片也只有30多字,字体特别纤细,要用5倍的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在钻凿和记时方面也有所不同,这反映二者既存在传承关系,又富有地区性特色。周原甲骨的发现令世人眼界大开,它证明甲骨卜辞并非殷王室所专有,西周也同样是甲骨文的时代,在对甲骨文的认识上产生一次可喜的飞跃。

由于周原甲骨再次出现一种由数字构成的特殊符号,过去在青铜器和甲骨上都有所发现,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张政烺先生在看到大会展示的新资料后,激动不已。当晚他用火柴棒充算筹,独自在房间里反复摆弄,第二天即在会上发表题为《古代筮法与周文王演周易》的短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先生认为这种仅用五、六、七、八四个数字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由老阴、少阴,老阳、少阳四个爻所构成的“卦”。而这批西周卜甲刻辞所见的均为六爻所组成的“重卦”,为周文王演“重卦”的传说提供了可贵的实证。至于为什么在卜甲上刻卦,则是研究当时卜和筮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张先生还指出:铜器铭文上的3个数字是“单卦”(即八卦),周原卜甲上的6个数字便是“重卦”(即六十四卦),《周易》中的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繁,其实只有阴阳二爻而已。接着,他把周原卜甲上的成串数字变成阴阳爻,在黑板上写出“蒙”、“蛊”、“艮”、“既济”四个卦名。会场上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对张先生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给予充分的肯定。

借此机会,顺便谈谈关于“一片龟甲的风波”。事情是这样的:会前,胡厚宣先生的弟子孟世凯在《地理》杂志上发表题为《谈谈甲骨文中有关蚕桑真伪资料》的一封信,提到“刻有这种蚕桑图的甲骨共有两片,经甲骨学家胡厚宣同志对实物的鉴定,发现都是假的,都是一种伪刻”。其中一片就是商承祚先生收藏的“尾甲”,信中还有所谓“谬种流传”之语。商先生这

次特地把这片“尾甲”带到会场，并藉着电光放大镜引来很多人围观。商先生大批孟氏“谬种流传”之说，气氛有些紧张。当晚商老接到广东省政府急电，要他立刻回穗，参加赴桂庆祝活动，第二天清早就乘飞机离开长春。商老离开后，会务组请胡厚宣先生发表意见，胡先生以商老不在场为由拒绝发言。我本来和商老同住在一个套间，商老走后，启功先生为了照顾史树青先生与家眷同住，便搬到商老的卧室来，这样，我便有缘与启老“同居”了。启先生一搬过来，整个套间便马上活跃起来，一下子来了许多人，有求墨宝的，有侃大山的，也有来向启老问候请安的，络绎不绝。那时室外已是零下十几度，整个南湖湖面结着厚厚的冰，可室内温度已近摄氏三十度，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张忠培主任负责研墨，偌大一个墨池，磨得他汗流浹背，就干脆把上衣脱掉。启先生见研墨者已经“赤膊上阵”，便蓦地站了起来，卷起袖口，命我铺纸，开始挥毫，一直写到深夜十一时许，人手一卷，皆大欢喜。熄灯就寝后，启老仍然滔滔不绝地谈了许多与我两位老师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当晚，启先生指示我设法劝说胡厚宣先生对商老提到的问题作出回应，就说现在商老虽不在场，胡先生的意见由你负责转达就好了。启先生这一招真灵，第三天胡先生终于同意发言了。胡先生的发言很谦恭平和，一提到商老，总是以“后学”自谦，非常客气，他只是就这片“尾甲”的刻辞部位、文例、刀法和界线等项，提出若干疑点，并由此引起大会对这片“尾甲”的真伪问题作了认真的切磋。我把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作了整理和归纳，呈商老备用。后来在陈炜湛的相关著作中有所介绍和论辩。经陈炜湛核实，商老所藏的这片“尾甲”，是胡厚宣先生最早以摹本著录于《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的（见《甲骨文简论》“关于‘契斋藏甲之一’的真伪问题”）。商老后来写成《一块甲片的风波》，发表在《随笔》（丛刊）第十集上（1980年8月）。

其它古文字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朱德熙先生考定了见于陶文和玺文上的“者”字，解决陶、玺文释读上许多疑难问题。张颌和高明先生对侯马盟书中的主盟者和被逐者是谁分别申述了各自不同的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商承祚先生总结自己对秦权辨伪的经验，提出“权”不是秤砣的推论，并就秦权诏文的句读发表了新的见解。此外，曾宪通和陈炜湛根据郭沫若先生在日本从事古文字研究期间写给容庚先生的数十通论学书简，联名发表《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一文，悼念这位刚刚去世的杰出古文字学家。

大会后期，与会者就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提出的《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展望》一文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为了我国古文字学科的发展，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队伍建设，一致同意成立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并推举出理事22人。建议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并决定1979年古文字年会由中山大学举办，大会推举商承祚先生为1979年理事会召集人。在中华书局党委的支持下，将出版带有会刊性质的《古文字研究》。

此时此刻，我们十分怀念于省吾、姚孝遂等等一批为这次里程碑式的古文字研究会运筹帷幄，并为古文字研究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目 录

| | |
|--------------------------------------|-----|
| 曾宪通:卅载回眸(代序) | 1 |
| 陈光宇:世界四种古文字的起源时空与文字结构 | 1 |
| 李先登:三论汉字的起源与形成 | 16 |
| 王 晖:新石器晚期组词成句类陶文与汉字的起源 | 20 |
| 蔡运章:论远古纺轮刻辞及其重要价值 | 28 |
| 徐义华:商代的天命思想 | 34 |
| 范毓周:殷墟卜辞中的“示典” | 39 |
| 孙亚冰:易国考 | 42 |
| 黄天树:谈谈殷墟甲骨文中的“子”字 | 49 |
| 连劭名:卜辞中的“游泛有疾”与《周易》 | 55 |
| 沈建华:释殷代卜辞择日术语“易日” | 59 |
| 沈 培:殷卜辞中跟卜兆有关的“见”和“告” | 66 |
| 林宏明:说殷卜辞见字的一种特殊用法 | 75 |
| 季旭升:说髀 | 82 |
| 冯 时:释“離” | 89 |
| 刘 桓:释甲骨文“遘、遏” | 96 |
| 张世超:释“妨” | 100 |
| 蒋玉斌:释殷墟自组卜辞中的“兆”字 | 104 |
| 刘 源:殷墟“比某”卜辞补说 | 111 |
| 董莲池:“率”字释涛说的几点疑惑 | 117 |
| 何景成:释“花东”卜辞的“所” | 122 |
| 陈 剑:“遘”字补释 | 128 |
| 郭静云:甲骨、金、简文“𠄎”字的通考 | 135 |
| 游顺钊:殷商卜辞前“家”的原始义蠡测 | 141 |
| 朱歧祥:论由系联的方法扩张研治花东甲骨的材料 | 146 |
| 蔡哲茂:殷墟甲骨新缀七则 | 153 |
| 王蕴智 门艺:黄组田行卜辞新缀 14 例 | 160 |
| 程鹏万:刘家庄北 M1046 出土石璋上墨书“𠄎”字解释 | 166 |
| 麦里筱:古汉字的第一个难产的标点:商周甲金文的重文符号“=” | 171 |

| | |
|----------------------------------|-----|
| 赵 诚: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探索 | 178 |
| 张懋镕:关于探索“复合族徽”内涵的新思路 | 183 |
| 严志斌:商周复合氏名探析 | 187 |
| 朱凤瀚:由伯戠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 | 192 |
| 叶正渤:宣王纪年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研究 | 200 |
| 林 沅:珣生尊与珣生簋的联读 | 206 |
| 陈英杰:谈颯簋铭中“肇享”的意义 | 212 |
| 武振玉:两周金文“暨”字用法释论 | 216 |
| 周宝宏:西周金文考释六则 | 220 |
| 张桂光:金文札记三则 | 228 |
| 张富海:读新出西周金文偶识 | 233 |
| 胡长春:金文考释二则 | 237 |
| 庄惠茹:金文“某伐”词组研究 | 239 |
| 李家浩:释老簋铭文中的“漚”字 | 245 |
| 陈 絮:关于“夷”字本义的一个假说 | 251 |
| 罗卫东:释新刊布应公鼎名“鬲” | 257 |
| 魏宜辉:说“裔” | 261 |
| 孟蓬生:解“颐” | 265 |
| 赵平安:唐子仲濒儿盘匝“咸”字考索 | 270 |
| 刘 雨:《商周金文总著录表》前言 | 275 |
| 裘锡圭:谈谈三年垣上官鼎和宜阳秦铜整的铭文 | 277 |
| 祝敏申:读中山国铜器铭文札记 | 283 |
| 白于蓝:读中山三器铭文琐记 | 289 |
| 唐友波:中山王罍“九祀”壶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 295 |
| 陈 平:燕国“燕”名之由来与“燕亳”、“匿亳邦”再议 | 300 |
| 吴振武:谈珍秦斋藏越国长铭青铜戈 | 311 |
| 黄锡全:介绍一件韩廿年冢子戈 | 318 |
| 韩自强:过眼云烟——记新见五件晋系铭文兵器 | 323 |
| 吴良宝:兵器刻铭与战国韩南阳郡新考 | 328 |
| 下田诚:再论三晋“冶”字 | 334 |
| 萧 毅:“中清”玺考 | 341 |
| 刘 钊:秦“敬老思少”成语玺考释 | 346 |
| 陈隆文:负夏方足布地望考辨 | 352 |
| 董 珊:侯马、温县盟书中“明殛视之”的句法分析 | 356 |

| | |
|---|-----|
| 姜允玉:《侯马盟书·字表》补正 | 363 |
| 刘彬徽:楚帛书“女娲”字释考论 | 368 |
| 禩健聪:楚简释读琐记(五则) | 370 |
| 田 河:楚简遣册文字释读五则 | 376 |
| 李 锐:读楚简札记(四则) | 382 |
| 顾史考:楚文“唬”字之双重用法:说“竞公‘痼’”及苗民“五‘號’之刑” | 387 |
| 王志平:“罷”字的读音及相关问题 | 394 |
| 陈斯鹏:楚简“史”、“弁”续辨 | 400 |
| 刘信芳:楚简“免”与从“免”之字试释 | 407 |
| 林清源:郭店楚简《语丛四》“𠄎”考释 | 411 |
| 陈伟武:上博简考释掇琐 | 418 |
| 范常喜:上博楚竹书文字补释八则 | 423 |
| 李守奎:上博简残字丛考 | 429 |
| 彭裕商:《孔子诗论》随记二则 | 435 |
| 廖名春:楚竹书《诗论》一号简“𠄎”字新释 | 437 |
| 徐在国:上博竹书(三)札记二则 | 443 |
| 萧圣中:周易卦爻辞选释四则 | 446 |
| 吴辛丑:楚竹书《周易·大坎》卦异文辨证(二则) | 450 |
| 徐富昌:上博楚竹书《周易》异体字简考 | 455 |
| 张新俊:释上博楚简《三德》中的“虞” | 464 |
| 王 辉:上博楚竹书(六)读记 | 467 |
| 杨泽生:《上博六》字词零释(五则) | 472 |
| 徐少华:上博简《申公臣灵王》及《平王与王子木》两篇疏正 | 478 |
| 陈 伟:上博楚竹书《庄王既成》初读 | 485 |
| 郭永秉:释上博楚简《平王问郑寿》的“讯”字 | 489 |
| 曹锦炎:楚竹书《问日》章与《列子·汤问》“小儿辩日”故事 | 494 |
| 罗运环:葛陵楚简鄂郢考 | 498 |
| 宋华强:释新蔡简中的一个祭牲名 | 501 |
| 张玉金:论出土战国文献中的兼词“焉” | 507 |
| 大西克也:战国楚简文字中读作舌根音的几个章组字 | 513 |
| 黄文杰:睡虎地秦简牍词语考释四则 | 519 |
| 江学旺:从“石”之字《说文》误析为从“广”例 | 523 |
| 叶玉英:谈谈音与饰笔 | 527 |
| 詹鄞鑫:关于古文字研究数字化方法的几个问题 | 532 |

世界四种古文字的起源时空与文字结构

陈光宇

前言

远古人类互相交流端赖图像符号与口语。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由于文化内涵的积累以及相邻文化的冲击影响,人类认识到图像符号可以与语音结合,从而创造发明文字。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借由文字的承载传扬,才有文明的诞生与成长^①。人类史上一共只出现过四或五个独立创造的起源文字:中东的苏美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System)、北非的埃及圣体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ic System)、中美洲的玛雅圣体文字(Maya Hieroglyphic System)以及汉字^②。苏美文与埃及文是拼音文字之先河,汉字则是东亚文明的奠基石。文字可以大分为形符文字(logographic writing)与音符文字(phonographic writing)^③。形符文字以形音二元素造字表意;音符文字则只以字母(alphabet),或音节(syllable)拼音造字表意。四种起源文字俱属形符文字。除汉字外,所有形符文字均已成为死文字。目前世界文字除了以形音相合的汉字外,均属拼音的音符文字。本文比较四种起源文字产生的时空背景及其文字结构,并初步探讨产生这些起源文字的文化因素与条件。

一、埃及圣体文字起源时空

古埃及由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43年共经历31个王朝^④。埃及王朝历史与其文字产生发展关系密切。埃及圣体文字在第一王朝(Dynasty 1)时已确知存在,经历三千多年到394年之后成为死文字,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宣博良(F. Champollion)利用刻在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公元前196年)的三语诏书(圣书体、俗体、古希腊文)将之解码破译^⑤。关于埃及文字起源,目前最早的考古证据可能是 Abydos 墓葬遗址 U-j 墓出土的陶器、象牙、骨片上所刻图符^⑥。U-j 墓遗址时间相当于第零王朝(Dynasty 0,约公元前3200年)。图一是一些骨片刻符。在第零朝代的纳玛王时代(约公元前3150年)图符已具备文字功能。如图二A陶尊之单体图符象一鸟立于方框之上,方框内两个象形图符,一象鲑鱼,一象凿子,被用作音符代表法老王纳玛的名字。图二B之石版上也可见刻有纳玛的图符及法老王的刻像。图三A之陶尊刻有

象蝎子的图符。图三 B 是刻在铜头(macehead)上的记事图画,时间相当于约公元前 3200 年。比照图二的纳玛石版,可以确定图三 A 陶尊上所刻的蝎子,指的正是图三 B 中头戴白冠(表示统领上埃及)手持锄形武器的法老王。这种将名字刻画在法老王肖像头前的作法常见于后世。所以即使我们无从知道陶尊图符之读音,它作为公元前 3200 年左右一位法老王的名字应无疑问。以是推论 U-j 墓出土两百多片骨片标签上的刻符(图一),虽然以单体出现,可能已是形音结合的原始圣体文字,其时约当公元前 3300 年^⑦。文字产生关键是人们认识到语音或语言可以与某个特定的图符或符号联系结合而达成更特定的表达沟通功能。由 U-j 墓出土的图符来看,当时埃及人已认知图符可以与语音结合,应该已经跨越过文字创造的关键门槛。其后埃及文字的发展在如何利用图符表示文法以及如何使文字与口语磨合。到了埃及中期王国时代(约公元前 2000 年)古埃及文已是极为成熟的文字。

二、古埃及文字结构

古埃及文字是形符文字。到公元前 2700 年左右,部分形符开始分化成为音符,有 24 个单子音符(1-consonant sign 或称埃及字母),70 多个双子音符(2-consonant sign)及三子音符(3-consonant sign)。虽然理论上埃及文可以完全用拼音方式表达,但是它一直保持着形音并存的形符文字形式。作为表意的形符被称为界定符(determinative)。例如“靚女”(the nubile young woman)古埃及字写作:𓆎𓆏𓆐𓆑𓆒。








此字由五个图符造成,𓆑是一个“三子音符”代表 n-f-r。中间三个图符,上两个是“单子音符”f 同 r,第三个是形音符,念作 t,作为字缀表示字词为“阴性”。右边图符是界定符,表示此字是指年轻的女子。所以左行及中行之拟音为(n-f-r-t)念成 nefere te,意思是豆蔻年华的靚女。

又如动词“离开”写作:𓆓𓆔。

由三符构形,左上符象“屋子”,此处作为“双子音符”读为(p-r)。左下符象“嘴”,作为形符时表示“嘴”,读为(r),作音符时即为字母“r”。此处作为音符,用来强调左行二符在此字的功能就是表音,右行的形符象双腿步行,是界定符。所以全字表示“出去”或“离开”。圣体文字之特点是不论形符音符,其象形程度很高,字与字之间区分不明,每字长短不一,视音符及附加符多少而定^⑧。

三、玛雅文字起源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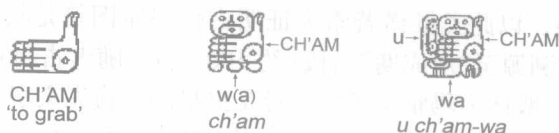
玛雅文明分布于中美洲包括墨西哥东半部、危地马拉及洪都拉斯西部等地。可大分为三期,公元前 1500 年至 300 年为“形成期”,300 年至 900 年为“古典期”,800 年至 16 世纪为“后古典期”。整个玛雅地区有大小城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习俗传统同属一个文化圈,但

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①。玛雅人以树皮作为书写媒介,数以千计的这种抄本在1562年被西班牙殖民教士焚烧销毁,仅有三、四本幸存于劫火。然而玛雅文字仍可见于在上百废墟遗址考古所得绿石、玉器、陶器、浮雕石碑、门楣、石阶。中美洲四百万玛雅印第安人,今日仍操玛雅语系口语^②。玛雅文字在16世纪已成死文字,破译其解码的功臣是俄国学者诺若索夫(Y. V. Knorosov, 1922—1999)。破码关键在于他发现在幸存的抄本中某些图符可以联系到现存的玛雅方言。他注意到图符常与火鸡图像联在一起。火鸡在玛雅方言中念成“kutz”,所以他假设图符代表“ku”而图符表示“tzu”。又因为玛雅语称狗为“tzulu”,所以他假设狗在玛雅文字中,应由与另一表“lu”的图符组成。果然抄本中绘有狗的图像旁即有图符。以此类推诺若索夫证明古代玛雅图符是具有表音功能的文字^③。玛雅文字原来认为只能溯源至“形成期”后段(约100年)。随考古事业进展,玛雅文字的起源定点不断往前推移,一般认为玛雅文字的前身是更早的奥梅克文字^④。目前已知中美洲至少出现过三种文字分布在玛雅、奥梅克(Olmec)及扎波特(Zapotec)三个地区,统称玛雅—奥梅克文字系统。奥梅克文明于公元前1200年出现于玛雅西边圣洛伦佐(San Lorenzo)高地的热带丛林区。奥梅克文明的许多特征,如建筑、玉器、美洲虎和羽蛇神崇拜等明显是中美洲文明的共同元素。在许多奥梅克遗址发现的文字图符与后来的玛雅文字相似而不尽同。例如在墨西哥Veracruz州发现的La Mojarra碑(约公元前300年,图四),其上420个奥梅克字符可以利用玛雅文字部分释读^⑤。数年前,在拉汶塔遗址(La Venta)附近San Andres得到一奥梅克陶釜,其上刻有一振翼之鸟,鸟嘴前有两道作发言状的符号,各接另外两个较为复杂的复合符号。很形象地表示这两个复合符号是由鸟嘴中宣读出来的声音(图五),其中可能指王,是以日名作为王名的图符,所以由鸟嘴读出的是时王名字,拟定为“3 Ajaw”^⑥。出土陶釜遗址时间相当于公元前650年。因此学者推测玛雅系统文字至少可溯源至公元前650年左右^⑦。中美洲地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有文化遗址,到公元前1500年的“前形成期”许多遗址出土文物多刻有图符,有相同性也有相异性。这些图符之间的关系,它们与后来中美洲各种古文字的关系以及中美洲文明起源是单一源头或多源头都是学者注意的焦点。例如学界对许多遗址出土更早的“中形成期”(公元前900—600年)奥梅克图符是否为文字即有热烈讨论。其中引人注意的是Stephen Houston提出的可能代表地名的图符(图六A),他认为这些图符是具备相当文化内涵的符号,如果确定作为地名或人名,自然应有公认的读音,可以视为文字,如此玛雅系文字当可溯源至公元前900年^⑧。最近在墨西哥圣洛伦佐一个筑路的采石场填土堆中发现一块长方形石块,其上有62个奥梅克刻符(图六B)。因为考古鉴定年代为公元前900年,学者推测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玛雅—奥梅克文字^⑨。

四、玛雅系文字建构

以“古典期”玛雅文字为代表的中美洲古文字系统是含音节的形符文字(logosyllabic)

writing)。理论上用 30 个音节符号应该足够拼写玛雅口语^⑩。但是玛雅文字始终没有成为纯拼音的音符文字,原因还待研究。玛雅文字由包括音符、形符的字符(glyph)以不同方式组合形成的字块(glyph block),再以字块组成章句。图七显示每个字块大小相似略近方形,由一个字符作主符(main sign),在四周附加其它字符,按照位置称为前符(prefix),后符(postfix),上符(superfix),下符(subfix)。有时在主符之中又嵌入一个内符(infix)。一般而言,主符通常为形符或意符,而附加符则用来表音或表文法词性^⑪。例如下例的第一符“CH'AM”是形符,表示以手抓持。第二符加了下符“m(a)”表示读音或表示整个字符可以用作音符。第三符有前符(u)表示第三人称他或她,还有下符(wa)表示这个字块用作动词。





玛雅字符多达 1500 种以上,一个字符往往有数种读音,而一个音节又可由多种字符表达,加之一个字块可以由不同字符按不同方式组成,有许多写法,实在相当繁复^⑫。

五、苏美楔形文字起源时空

苏美文明起源于今天伊拉克两河流域南端乌鲁克地区(Uruk)。其文字产生发展始于乌鲁克四期(Uruk IV, 约公元前 3300 年),苏美人大约在公元前 2600 年(Early Dynastic II)时已使用 940 个字符。到公元前 2150—公元前 2000 年(Ur III, 乌尔三期)精简到 500 字符,称为新苏美楔形文字(Neo-Sumerian cuneiform)。其后,苏美王朝为中东亚述及巴比伦取代,虽然种族语言不同,但是一直保持使用楔形文字的传统,遂有旧亚述楔形文字(Old Assyrian cuneiform, 公元前 2000—公元前 1500 年)及新亚述文字(Neo-Assyrian, 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前 75 年),字形逐渐简化。公元前后,楔形文字成为死文字^⑬。直到希腊时代之前,凡是在两河流域建立政权的每个民族包括埃兰(Elam)乃至远在小亚细亚的赫梯(Hittiti)等都使用楔形文字^⑭。公元前 1765 年,德国尼布尔(C. Niebuhr)在波斯古都(Persepolis)附近村庄发现三语并列的摩崖石刻(古希腊文、古波斯楔形文、苏美楔形文),遂成苏美文字解码之钥,其中德国罗林森(H. C. Rowlinson, 1810—1895)贡献最大^⑮。目前苏美文字最早的考古证据是古城乌鲁克出土属于乌鲁克四期的四千块泥版,其上多刻划数字、农产品。其记录事项可能与商品交易、税收、记帐等经济活动或行政管理有关。例如图八所示,其数字符号表示 135,000 单位的容量。以菱形圈起的数字符号表示 37 个月份。一个象形图符释表示大麦,泥版右下两个图符不能全解,可能表示记录此版的目的,或为抵税,或为酿酒,或为交易。版左下端二个符号常见于其它泥版,推测可能为人名或官名,因为其构型与后世已知音读的图符相近,所以拟音为 Kushim。类似研究可以确知在乌鲁克四期时,苏美

人已经将语音与特定的图符结合,因此学界认为苏美文字在公元前 3300 年左右已经产生^④。

六、苏美文字建构

苏美原始文字所用形符象形性很高,但是显然因为使用泥版及芦秆为刻写工具的缘故,到公元前 2400 年已经相当抽象化(图九 A)。除了象形的形符外,苏美文字也利用类似会意的方式造字,例如以字符“头”加字符“碗钵”而形成新的字符“吃”字,写成(图九 B)。苏美文字在公元前 2800 年左右,已经用特定的形符作为音节符号来使用。例如大麦在 3000 年写作,读成 še(发音近似 xie),后来即成为表示 še 的音符。音符的产生使得口语中的文法能够具体地以文字表达,促进文字与口语的结合^⑤。苏美楔形文字由象形,90 度倒转,及抽象化的过程由下例“头”字可知。一个公元前 3200 年表示“头”的图符,演变到公元前 1000 年,已难识其原来面目。苏美文字的极度楔形化可能是加速中东其它文字音符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汉字起源时空

汉字是被持续使用最久及唯一进入电脑时代存活的起源文字,也是唯一不需解谜破译的起源文字,目前最早的汉字考古证据是商代甲骨文,其使用地域至少涵盖今日之山东、河南、陕西,面积远大过其它三个起源文字的所在地。商代甲骨文已是发展成熟之文字,所以汉字溯源应该远在商代之前。笔者曾提出可以由考古、文献、及建立数学模式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察,推测汉字起源定点^⑥。考古方面,中国境内遍及各地带有刻符器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由贾湖、双墩、仰韶、龙山而至中商其年代涵盖六千年没有间断(表一)^⑦。其中河南舞阳贾湖村遗址刻符,时间远早于苏美、埃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文化遗址的地理位置,几无例外,多紧邻江河湖泊,均分布于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流域。可以想见当时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水路交通应该相当方便,适宜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例如蚌埠的双墩文化区即可借助淮河许多支流,北连黄河,南通长江。从贾湖一直到龙山文化遗址所见刻符均为单体图符,一器一符。根据刻符在陶器上的位置以及器物在一些文化遗址出现的规律,一般认为刻符应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至于是否祭祀、经济、政治,或是表示所有权关系等功能仍有待深入研究。到了公元前 2500—2000 年,有的遗址出现连串刻符,数符相连有似短句。著名的有属龙山型的丁公村陶文、南荡文化的高邮龙虬庄陶片、良渚文化的澄湖黑陶贯耳壶四字刻符以及灰黑贯耳壶的九字刻符等。另外山西襄汾陶寺出土一陶扁壶,有毛笔朱书三个

符号。这些刻符是否文字还没有定论,这些连串刻符已脱离象形,俱作方块字形,与汉字相似^③。其中两个贯耳壶的连串刻符虽不能解读,其构型与甲骨文字已颇为近似。但是龙虬庄与丁公村的陶片刻符与甲骨文字构形相去较远,很难看出相承关系。丁公陶文至少有 11 个刻符排列成行,似已构成短文,应该是有一定发展水平的某种文字系统^④。学者曾指出丁公陶文与古彝文相近,如果结合古彝文文献及彝族占卜习俗来将 11 个刻符与古彝文排比,可以通读^⑤。此说是否定论尚有待继续研究。即使丁公村、龙虬庄的连串陶文不是甲骨文的直接前身,它们的发现至少说明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中国三大流域已有其它文字系统与当时的汉字并存。以中国疆土之广袤,远古存在几种不同的文字及语言系统应该是可能的。以此推想,文献上一些上古人名如蚩尤、颛须、共工、不窟、庆节、差弗、毁隃、寒泥、不降等用字怪异,原意不明。这些名字可能源于非汉字系统的人名,后来因为音译而以汉字记音并得以保存流传在汉字文献之中^⑥。

结 论

各种起源文字之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的过程应该包括如下阶段:(一)利用图像或记号来记事沟通。(二)在文化圈内的共识基础上,部分图像符号形体固定成为图符或形符。(三)图符与口音结合产生原始文字(proto-writing)。(四)文字可以表示文法得以与口语较密切地结合成为成熟文字。人类互相沟通交流主要靠视觉辨识占有空间的图像或靠听觉认知占有时间的语音。人类使用口语有十万年历史,使用图像也有三万年历史。图像与语言原是两条平行的人类交流方式。文字的产生代表这两种交流方式的交集结合。所以固定图像(图符)如果能够证明它含有特定读音即可视为原始文字,在初创阶段的原始文字多只用来表示人名、地名或物名,当一些图符分化成为音符可以表示文法特征时,文字才能与口语较为紧密地结合而成为成熟文字。学者讨论推测苏美、埃及、玛雅等古文字的起源定点所用的方式在于决定考古遗址所见图符是否可能有表音功能。如果答案为“是”,则认为该图符代表文字。准此,虽然图三 A 的陶尊只有一个象形图符,但是该图符可以确定是法老王“天蝎”之名。既是人名,则应有相伴之读音,虽然不能确知当时“天蝎”读音为何,但可推测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埃及已有原始文字。准此,苏美文字最早的考古证据为刻划有数字、实物、人名的泥块(图八),即使不知其当时读音为何,也可推断这些是形音结合的文字。同理,学者认为中美洲的玛雅—奥梅克文字系统可上推至公元前 900 年^⑦。

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人们总是在猜测在如此成熟的文字系统出现之前,一定有其源远流长的创制过程^⑧。经过考古界数十年的努力,在许多文化遗址都发现刻画于陶器或陶片上的各种陶符,由贾湖、双墩一直到丁公陶文,时间横跨将近四千年。各个文化遗址所见陶符的功能,其内在外在的联系,时间前后的关系,以及这些刻符是否文字或是否汉字前身都是目前重要研究课题。讨论陶文刻符与汉字起源关键问题是这些刻符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证明

它们具备文字功能。关于大汶口陶尊,学者早已注意到所见图符刻于灰陶大口尊外壁上腹部,有的涂填红色,构形位置均类似商代青铜器铭文。大口陶尊只见于大中型墓,陶尊有表现墓主身份的功能。有的刻符明显由二至三个图符组成,也已符合会意造字之原则。此外,同一刻符出现在相距一百公里的不同遗址,表示刻符已具共识基础有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将大汶口陶尊刻符与埃及早期陶尊上所刻代表时王名字的图符(图二、三)对照,并运用学者定点埃及、玛雅、苏美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大汶口刻符表示人名、族名、或者神名,则应已具读音符作为原始文字的条件^①。准此,一些良渚刻符,特别是与大汶口相似的刻符应可视同原始文字^②。

讨论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可以有渐进的或突发的产生模式^③。苏美、埃及文字的产生,由图符至原始文字的出现,经过时间很短,所以学者认为其文字产生是突发式的。至于汉字,如果其文字产生定点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④,则由图符进展至原始文字经历有 3000 年之久,如此,则汉字产生当属渐进式的模式。另外埃及、苏美文字,一在尼罗河流域,一在两河流域,其文字产生的源头可能是单极性的。相比之下,在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流域的广大面积上许多文化遗址俱有图符陶文产生,所以汉字产生的地理背景远较苏美、埃及复杂。远古中国可能有不止一个的原始文字产生存在。几种远古原始文字经过淘汰或融合,最后以成熟的甲骨文字出现,成为我们熟知的汉字。按照这样的设想,汉字的产生应该是属于多极性的,其产生发展所经过的途径可能与埃及、苏美文字很不相同。讨论文字产生另一个课题是分析产生起源文字的主要动力。就目前所知资料而言,我们认为第零朝代法老王统一上下埃及是古埃及惊天动地的大事,表示王权应是埃及文字的产生动力。苏美文字产生动力可能是商业行为及行政管理。玛雅—奥梅克文字的产生可能也是与城邦王权有关。至于汉字的产生如果是多极性的,则三大流域数种不同原始文字产生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仍有待深入研究。

注:

- ① Geoffrey Sampson:《Writing System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年,第 1—25 页。
- ② 有学者认为北印度的哈拉般刻符(Harappan System)是起源文字。最近有学者如 Steve Farmer, Michael Witzel 详细论证认为它们不代表文字。可参看:Andrew Lawler:《The Indus Script, Write or Wrong?》,《Science》306 卷,2004 年,第 2026—2029 页。
- ③ 本文将 logographic writing 翻译为“形符文字”。形符可以有表音的功能,例如汉字用假借、形声等造字方式表音,其它起源文字将部分形符分化成为音符。西方文献或将含音符的形符文字称为 logosyllabic writing,而纯粹使用音符(包括字母或音节)的文字则称为拼音文字(spelling writing)。关于一般文字种类构型的讨论可参看:Bruce G. Trigger:《Writing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evolution》,《The First Writing, 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Stephen D. Houston 编,2004 年,第 39—70 页。
- ④ Peter A. Clayton:《Chronicles of the Pharaohs》Thames and Hudson Press 1994 年第 1—224 页。